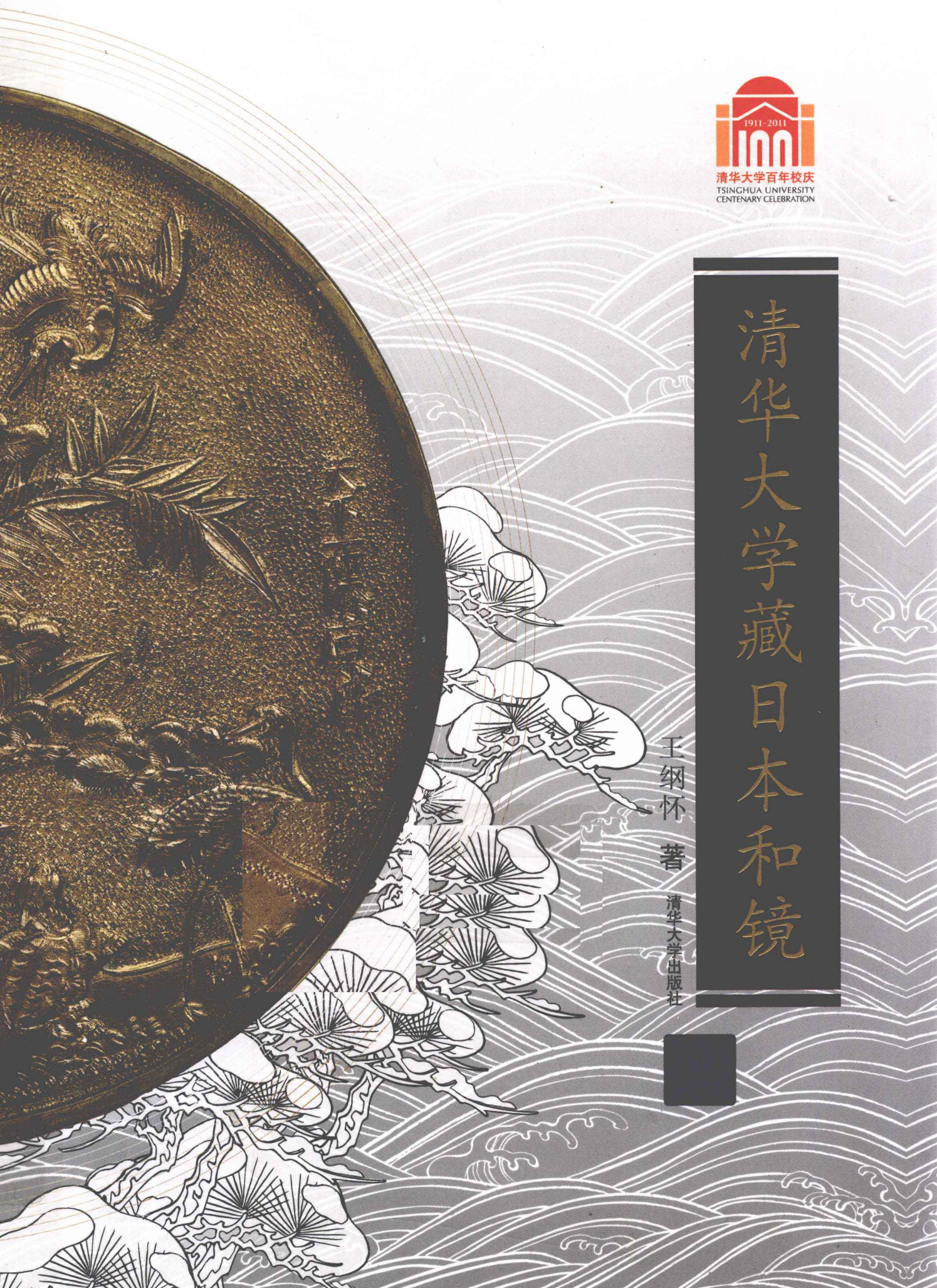




清华大学藏日本和镜

王纲怀 著
清华大学出版社





清华大学藏日本和镜

王纲怀 著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北京

内容简介

日本和镜有仿汉式、仿唐式、纯和式三个历史阶段，本书着重展现在东亚文化史上有一定地位的纯和式镜。比较而言，自宋代以后，中国铜镜日益衰落，日本和镜逐渐兴起。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书中百面和镜的重点在江户时代的蓬莱纹镜，蓬莱纹是源于中国战国时代的长寿文化的代表纹饰。

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，无标签者不得销售。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：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清华大学藏日本和镜 / 王纲怀著. —北京：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11.4
ISBN 978-7-302-25161-3

I . ①清… II . ①王… III . ①古镜－日本－画册 IV . ① K883.135.22

中国 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1）第 047027 号

责任编辑：甘 莉
责任校对：王荣静
责任印制：杨 艳
出版发行：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：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
http://www.tup.com.cn 邮 编：100084
社 总 机：010-62770175 邮 购：010-62786544
投稿与读者服务：010-62776969，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
质量反馈：010-62772015，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
印 装 者：北京天成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：210×297 印 张：14.25
版 次：2011年4月第1版 印 次：2011年4月第1次印刷
印 数：1～1500
定 价：180.00元

清華大學藏日本和鏡

耿東林



和



他山之石
可以攻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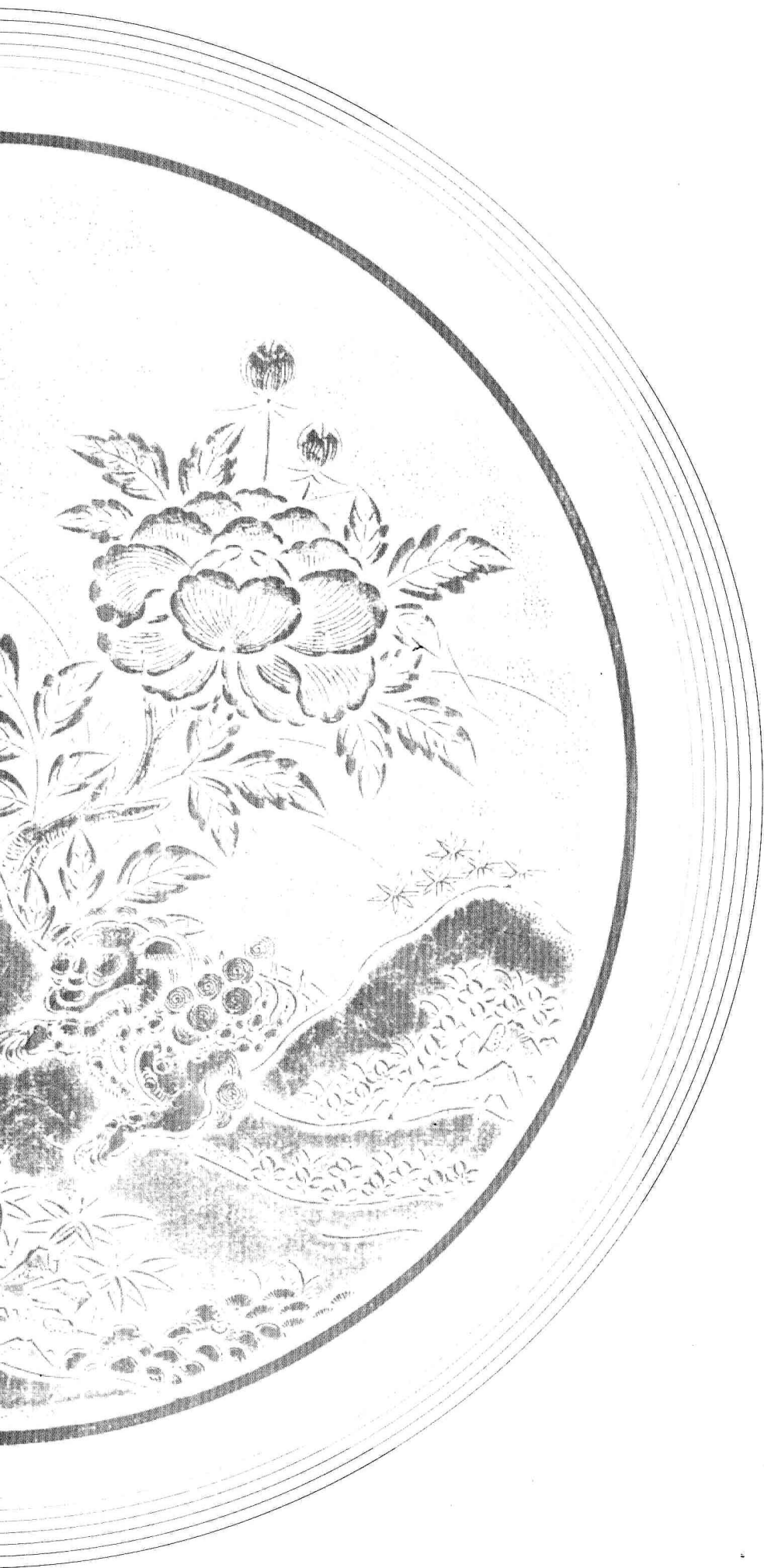
祝王綱怀先生

《清华大学藏日本和鏡》一书出版

二〇一〇年庚寅初冬

羅哲文





序 言

2011 年春天，清华大学将迎来百年校庆，海内外清华学子都在积极筹划向母校百年华诞献礼。王纲怀先生是清华 1958 级土木建筑系校友，他已先后向母校捐赠了自己多年的珍藏——100 面中国古铜镜、100 面日本古铜镜，并花大力气撰写了《清华铭文镜》与本书，既献实物又赠文化，以支持清华大学人文学科的发展。作为同是清华校友的我，从心底里赞赏、钦佩他的这一义举，同时也对本书的出版表示诚挚的祝贺！

我在 2008 年曾为王纲怀先生的《日本蓬莱纹铜镜研究》一书作序，其中提到，虽然时代不同，但我们都先后是梁思成先生的学生，都曾得到恩师的教诲。特别值得提出的是，梁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，尽力挽救过日本京都和奈良两个古都，保存了许多后来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建筑瑰宝。今天，王纲怀先生编著这部日本铜镜研究的著作，同样是为中日文化交流、研究作出的极好贡献。梁师如果在九泉之下有知，定会感到十分欣慰。

在 2004 年至今的短短数年中，王纲怀先生在铜镜研究领域可谓成果丰硕，已出版了《三槐堂藏镜》、《唐代铜镜与唐诗》、《日本蓬莱纹铜镜研究》、《止水集——王纲怀铜镜研究论集》、《清华铭文镜》等多部专著；在国家级的报刊、杂志上连续发表了《莽式铭文镜》、《新莽镜单于举土铭释考》、《铜禁时期钱监铸镜》、《闰七月铭南唐镜纪年考》等研究论文 20 余篇。本书是他在一年多搜集大量素材的基础上，顶着今夏上海罕见之酷暑，花费了两个半月时间才赶出来的，足见其勤奋、探索的勇气和对铜镜文化的热爱与执著。今天，他不但是国内知名的收藏家，他还独辟蹊径，以一个战略研究学者的眼光、工程技术专家的视角，将铜镜的研究扩展到诸多新的领域，给铜镜的收藏和研究带来许多新的成果。

在本书中，王纲怀先生以“中日镜谊”为切入点，叙述了铜镜作为中日文化交流“使者”的地位，对和镜的定义及其发展历史都有深入的研究和论述。他对书中的 100 面和镜，别出心裁地进行了从 A 到 L 的 12 种分类，并给予每面和镜以“大名”（连续编号 1～100）与“小名”（分类编号 A1～L7），让读者可以非常方便地对每一面和镜进行定位查找。在《日本蓬莱纹铜镜研究》的基础上，王纲怀先生又上了一层楼，他将蓬莱纹镜中出现的南天纹饰与《本草纲目》对照，提出“难道和镜纹饰中的南天，

就是蓬莱仙境中的不死药吗”这样一个极具开创性的问题。

本书较为全面、系统地反映了日本的和镜文化。王纲怀先生独具慧眼，挑选了 19 面汉字书法镜列入其中，说明他善于寻找亮点，长于发掘重点，让读者能方便地“窥一斑而知全豹”。书中运用自如地将中国的唐诗、宋词与日本的和歌、俳句结合到和镜文化之中，反映出王纲怀先生出色的洞察能力和文化功底。

作为经历过那场战争的老人，我们最向往的是中日两国世代友好交往，对于日本文化中优秀的部分，我们也应该认真、深入地去认识、研究、借鉴，从而发展我们自己。和镜，作为日本文化的“沧海一粟”，无疑也折射出日本社会发展的一些特征。如王纲怀先生所说，中国古铜镜在经历了战国的兴盛、两汉的繁荣、隋唐的辉煌之后，逐渐有江河日下之势，而和镜却在近几百年中争奇斗艳、推陈出新。这一东亚文化的兴衰历史，非常值得研究与了解。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

中日友好源远流长，中日文化交流世代繁昌。王纲怀先生所作的中日铜镜文化的研究，正是一件功不可没的好事、实事。“一衣带水 亲密邻邦 中日友好 地久天长”，那是在 2009 年 9 月 18 日，已故前日中友好协会会长，著名社会活动家、画家、国际和平使者平山郁夫先生，为以我为团长的中日友好代表团举行的招待宴会上，我即席所成，并恭书之，以为对此书出版之祝贺，对中日友好地久天长的祝愿。

罗哲文

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

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（原会长）、专家委员会主任

2010 年 10 月 10 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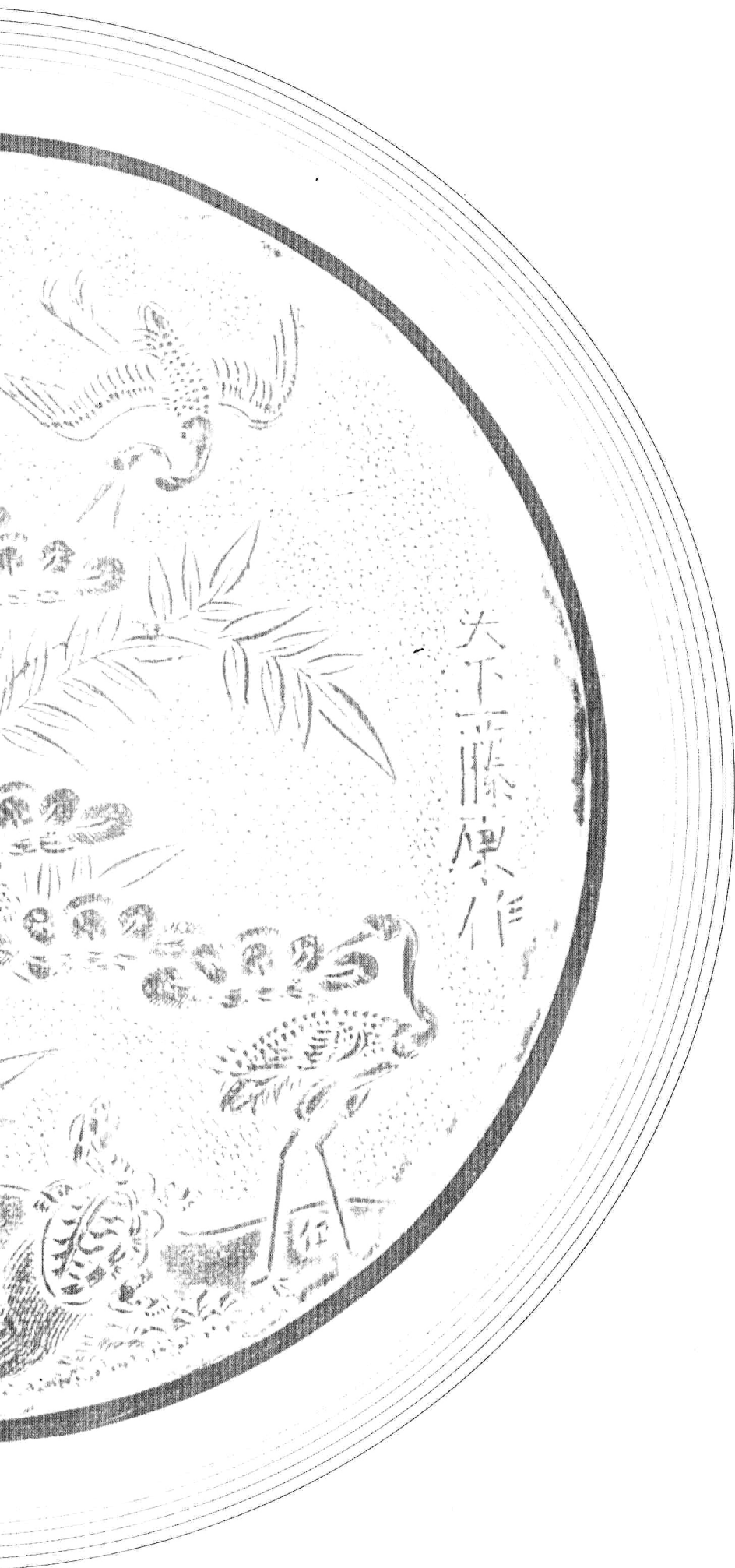
一衣帶水 桑鄰邦

中日友好 地久天長

二〇〇九年九月十六日中日友好協會
名譽會長前會長平山郁夫先生在東
京舉行的招待宴會上，即席成小詩一首
以為答謝以志不忘

羅哲文 拜書





大下藤原作

前言

人类照容需用铜镜，其起源时间大致接近。中国铜镜传与黄帝同步，距今约 5000 年。从出土文物看，最早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古代伊拉姆王国的铜镜，距今在 4500 年至 4000 年。中国齐家文化出土多面铜镜，距今约 4000 年。埃及有柄手镜最早出土于中王国第十七王朝，距今约 3600 年。古希腊迈锡尼时代的青铜镜距今约 3300 年。距今 3100 年前的殷商，开启了华夏文明的完整铜镜史。

作为青铜器的一个特殊门类，中国历代铜镜蕴涵诸多特色：铸制历史连贯，考古断代便捷，文化内涵博大，审美情趣彰显，证史直观翔实，书体映照生辉。其中尤以汉、唐两代铜镜，对东邻日本影响重大。

大体而言，日本和镜分为仿汉式、仿唐式、纯和式三种，本书内容主要集中在纯和式。日本和镜在吸收与消化中国的汉文化、唐文化后，有了自己的长足发展，经过长时间的过渡，在江户时期已完全形成了日本自己的民族特色：改圆钮为有柄，标注工匠姓名，铸制渐趋精良，纹饰琳琅满目，构图犹如绘画，镜铭大字精美。

蓬莱纹直接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之一的长寿文化。在本书 100 面日本和镜中，有蓬莱纹内容者 52 面（B 类 4 面、C 类 8 面、D 类 7 面、E 类 30 面、F 类 3 面），其中带鲜红果实“南天”（即中国之“南天竺”）纹饰的有 4 面（C1、E2、E8、E27）。华夏文化中有“不死药”的记载，秦始皇、汉武帝都曾派员至蓬莱仙境的三神山去寻觅“不死药”；明李时珍《本草纲目·南天》中有“久服轻身不老”（见本书 J3 文字）。华夏文化中的“不死药”系为抽象的主观意识，扶桑文化中的“南天果”乃是具象的客观存在，两者怎么会在上述四镜中有所结合呢？难道和镜纹饰中的“南天”，就是蓬莱仙境中的“不死药”吗？本书揭示了这一神秘现象，期盼读者能饶有兴趣地读完这本小书。

汉字在东亚文化圈享有崇高的地位。在本书 100 面和镜中，直接点明纹饰主题之大字镜铭者为 19 面，其中尤以草书（如 D1、G3、J6、L4、L7）、行草（如 D2、D3、D4）、行楷（如 H7、L3）10 面和镜之书体出类拔萃，情驰神纵，俊逸潇洒。从中可看到扶桑民族在江户时代热爱汉字、钟情汉文化的特点。

中国了解日本的程度远不如日本了解中国。日本较多地了解中国，必然有益于日本认识并发展自己；中国若亦能了解日本，同样有助于中国认

识并发展自己。日本和镜虽是日本文化中的“沧海一粟”，却能折射日本文化乃至社会的各个方面。笔者希望通过对日本和镜的介绍与研究，对了解日本文化做些粗浅的探索。中国铜镜兴盛于战国，繁荣于两汉，辉煌于隋唐，宋代以后在总体上却是一种江河日下的状态。相比之下，日本和镜在近几百年中却是争奇斗艳、推陈出新，颇有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之感，这在东亚文化之兴衰上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变化。“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”，我们应当对日本文化有所了解，主动了解。

本书百面和镜原系笔者悉心收藏，为贺清华大学百岁华诞并支持人文学科发展，继捐赠百面铭文镜之后，再奉献书中的这些实物，供母校永久留存。

王纲怀

1958 级建筑系

母校百岁华诞前夕于上海

和镜概述

一、中日镜谊

日本铜镜在日本被称做“和镜”，这是一个绚丽多姿、断代有序的文化宝藏。和镜纹饰蕴涵丰富。和镜文化包含了日本民族的人文理念、风土民情、动物植物、工匠纪年等诸多学术内容。存世量以蓬莱纹和镜最多，其中又涉及中日交往、文化传承等与日本民族文化密切相关的重大课题。

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，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。《后汉书》卷八十五：“建武中元二年（公元 57 年），倭奴国奉贡朝贺，使人自称大夫，倭国之极南界也。光武赐以印绶。安帝永初元年（公元 107 年），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，愿请见。”在与中国最近的日本南部曾多次出土中国汉镜：福冈县春日市须玖冈本遗迹 D 地点出土西汉中期的星云纹镜（直径 15.8 厘米）；佐贺县唐津市田岛遗迹 6 号瓮棺墓出土西汉中期的日光连弧镜（直径 6.9 厘米）；福冈县饭塚市立岩崛田遗迹 10 号瓮棺墓出土西汉中晚期的昭明—清白重圈铭文镜（直径 15.4 厘米）；佐贺县唐津市樱马场遗迹出土新莽的尚方铭四灵博局镜（直径 23.2 厘米）；佐贺县上峰町二塚山遗迹 29 号土坑墓出土东汉早中期的四乳龙虎镜（直径 14.1 厘米）；佐贺县伊万里市午戾遗迹 10 号石棺墓出土东汉早中期的八连弧云雷纹镜（直径 19.7 厘米）。

自东汉初至南宋末，在两国 1200 余年的友好交往史中，^①中国铜镜始终扮演着中日友好使者的角色。魏景初二年（公元 238 年）六月，魏明帝曹叡在赐给倭女王卑弥呼的一大批礼品清单中，就有“铜镜百枚”，并云：“悉可以示汝国中人，使知国家哀汝，故郑重赐汝好物也。”魏正始元年（公元 240 年），魏齐王曹芳又“赐金、帛、锦、罽、刀、镜、采物，倭王因使上表答谢诏恩”。两次诏赐物品充分说明，当时铜镜已成为国家的重要礼品之一。2000 年来，从中国舶载到日本的铜镜，为数不少。有幸的是，我们这一代人能亲眼目睹约在 1800 年前曹魏赠送倭女王卑弥呼“铜镜百枚”之一的实物照片。1994 年 3 月 17 日，日本有关方面发布了重要新闻，在京都府竹野郡弥荣町大田南古坟群 5 号坟，出土了一枚中国三国时代有纪年铭的四灵博局镜^②，此镜外区一周 39 字铭文：“青龙三年，颜氏作竟成文章，左龙右虎辟不详，朱爵玄武顺阴阳，八子九孙治中央，寿如金

① 拙著：《日本蓬莱纹铜镜研究》附表一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。

② 直径 17.4 厘米，详见中村淳晤《邪马台国的荣光》，日本京都出版，1995。

清华大学藏日本和镜

石宜侯王。”魏青龙三年（公元235年）是三国魏明帝曹叡执政的第九年，比送“铜镜百枚”的景初二年（公元238年）早了3年。因此，有关专家认定，这是当年“铜镜百枚”的其中之一。此镜出土引起轰动，因而亦成为中日两国友好交往史上一件十分有价值的实物。

有唐一代，佛教在中日两国盛行，鉴真东渡以及大批遣唐使、留学生与学问僧等频繁往来于两国之间，广泛而深入地推动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。经过1200年的斗转星移，就在中国邦交正常化之前半年的1972年3月，日本奈良高松塚古坟，出土了一面蟠龙纹海兽葡萄镜。据王仲殊先生考证，这是一面经日本遣唐使带回，由忍壁皇子保存的器物，并在日本庆云二年（公元705年）入葬。此事在中日两国之间留下了不少佳话。^①木宫泰彦在《日中文化交流史》一书中，一语中的地说：“遣唐使表面上始终是为了敦睦邻谊，但实际上输入唐朝文化产品却是主要目的。”唐风对日本的影响与延续，在一些领域甚至超过了中国自己。今天仍被日本引以为荣的唐风，有佛学、建筑、书法、茶道、围棋、相扑、和服以及喜欢图案“鹤”、爱好数字“五”等民间习俗。尤其是从日本正仓院以及东大寺、法隆寺等大寺名刹收藏的至尊唐镜^②来看，唐王朝有着“尽其所有”的待客之道，正仓院有着“千古珍藏”的保存之功，才使今天的我们能够亲眼看到流光溢彩的唐代珍宝。冥冥之中似有天意，两者缺一不可。

二、和镜定义

唐晚期，中日友好交往一度中断。日本在铜镜制作上，除了继续仿制唐镜外，逐渐发展了有自己“独特”风格的和镜。日本独创的和镜显示了日本文化的民族性。日本早期的汉式镜、唐式镜与华夏文化紧密联系，从平安前期开始，由日本自己独创的“纯和式”和镜（如本书A1镜），其内涵仍与华夏文化有着深层次的联系。

1928年，广濑都巽曾对和镜作出定义：“所谓和镜，是指由日本制造的古器物，可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说法。首先是‘仿制式’，即受到中国影响后，对汉魏六朝以来的铜镜进行仿制；其次为‘纯和式’，即从平安时期（公元794—1184年）开始，‘摆脱了中国的束缚’……逐渐形成了完全由日本自己独创的制式。狭义而言，这才是真正的和镜。”^③

1974年，广濑都巽再次对和镜定义：“和镜系指我国（日本）铸制的铜镜，大体上可分为两类：一类是从原始时代到奈良时期，虽雕模、铸造

① 拙著：《止水集·从中日出土同模唐镜说起》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。

② 拙著：《止水集·日本正仓院藏镜》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。

③ 广濑都巽：《考古学讲座·和镜》。

等技法各有不同，然其图案都受到过中国的影响，主要是模仿汉魏六朝以及隋唐的铜镜纹饰；另一类是平安时期以后，开始逐渐摆脱中国的影响，体现出赞美大自然的民族性，所创造的铜镜纹饰是一种明快而典雅的纤细手法。”^①

1992年，《广辞苑》释“和镜”：“和镜是指在唐式镜以后，从平安中期（公元794—1096年）开始，（日本）制造了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金属镜。和镜以镰仓时期（公元1185—1332年）最为兴盛，从此便与仿制镜有了明显的区别。”^②

1997年，久保智康总结性地说道：“这些（仿汉、仿唐的）日本镜通常不叫‘和镜’。和镜这个概念还有另一个意义，即由日本工匠特意用日本纹饰制作的铜镜……即在平安时代后，除唐镜外的所有铜镜。”^③

1958年，王仲殊先生提出：“日本古代文化受中国的影响独多，这在作为美术工艺品的铜镜上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。日本古代的铜镜，按时代先后，大致上可以分为‘汉式镜’、‘唐式镜’与‘和镜’三大类。前两者系由中国传入，照样仿制；后者具有日本独特的风格，但亦系自唐式镜脱胎而出。日本的‘和镜’，发生于平安时代（公元806—1184年），经镰仓（公元1185—1332年）、南北朝（公元1333—1391年）、室町（公元1392—1572年）、安土桃山（公元1573—1614年）直至江户时代（公元1615—1867年），有它本身的发展、演变的过程。各个时代的特征，可以从镜的形制、花纹及铭文中看出来。”^④

三、和镜简史

根据日本青木豊《和镜的文化史》一书，经过归纳，我们对和镜的由来与演变可以知道一个大致的脉络。

奈良时代（公元645—793年，即中国的盛唐至中唐时期），唐镜在日本盛行，“这是国家（日本）由吸取唐文化而迈进的时代……在遣唐使制度被废止后，失去了对唐文化的咀嚼与吸收……在漫长的过渡时期中，主要是唐镜与和镜这两者兼而有之的形式”。

平安时代（公元794—1184年，即中唐至南宋早期），在其后期（公元1097—1184年）出现了藤原镜，“这时的铜镜制式与纹饰，都脱离了唐镜原有的观念，主要以自然情趣来体现。纹饰或以松、梅、山吹、柳、菊、

① 广濑都巽：《和镜的研究》，日本，角川书店，1974。

② 《广辞苑》，日本，岩波书店，1992年第4版第2754页。

③ 久保智康：《和镜》，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，1997。

④ 王仲殊：《关于泉州出土和镜的说明》，载《考古通讯》，1958年7期。

清华大学藏日本和镜

龙胆、女郎花、抚子等植物来表现；或以鹤、鸳鸯、长尾鸟、雉子、鹭等鸟类来表现；或反映《枕草子》、《源氏物语》等人物故事……此外，镜形多由圆形改为八棱形；镜径由大变小至10厘米左右；重量上由厚到薄，从而成为纤细的器物……这个时期的代表性器物就是‘松喰鹤’镜，此类镜的基础，是将唐双鸾花枝镜上的双鸾演变为双鹤，花枝改成松柏……这些生物（松与鹤）都有千年寿命，在日本被赋予保护神的地位……‘松喰鹤’镜是平安时代后期和镜中的杰出作品……中国宋代，湖州镜大量输入，铜镜背面铸有‘湖州石家真念二叔青铜照子’等铭文。这个镜种薄而无纹，材质大多为亚铅，质量恶劣粗杂，完全没有唐镜的质朴，这也成为生产高质量和镜的触发点；湖州镜的多种形状却被和镜‘承认’并延续”。

镰仓时代（公元1185—1332年，即南宋早期至元晚期），和镜进入了一个初创期。“由于铸造技术的提高，在外形大型化的同时，镜体变厚。材质以优良的白铜代替，给人以庄重感。在纹饰方面，采用了细致的写生手法，使镜面洋溢着充实感。平安时代多用简单的线条来表现平面的东西，镰仓时代却采用了高浮雕与半立体的手法，使纹饰的远近感得以充分表现。概括而言，这一时期从形态到纹饰各个方面，都得到了广泛的发展，一般亦称之为和镜的成熟期。从美术角度来看，有许多精美的镰仓和镜被保存下来。另一方面，平安时代的自由情趣与纤细风格却没有得到传承”。

南北朝、室町时代（公元1333—1572年，即元末至明中晚）是和镜铸造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，镜体变厚，镜形变大，钮座多由龟座代替菊座，“就好像未开化民族见到了美丽的玻璃制品一样，室町时代的和镜是人们力争索要的器物……这个时代的纹饰还没有见到长生殿镜与龙宫镜等新型题材……从室町后期（日本称为战国时代）开始，由于逐渐受到湖州镜的影响，和镜好像星星一样，越发美丽”。整个江户时代的有柄镜系都起源于这个时代。

安土桃山时代（公元1573—1614年，即明晚万历年间），“告别了室町时代有柄镜的特点，镜柄端部的小孔不复存在；镜背纹饰虽还继承室町时代的蓬莱纹，然左右对称的格式已逐渐消亡；龟钮的情况虽还继续存在，但钮孔已没有系镜的作用；此外，纹饰的底面已由平地纹变成了粗砂状地纹，这种手法以省略机械加工为目的。安土桃山时代和镜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，镜师（工匠）姓名开始登场，并出现了工匠自我吹嘘为‘天下一’的铭文”。

江户时代（公元1615—1867年，即明晚至清晚），分为前期（公元1615—1689年）、中期（公元1690—1767年）、后期（公元1768—1867年）三个时期。“与室町时代相比，江户时代和镜出现了大型化的趋势，镜柄